



条件检索

标题

全部 栏目

查看

成功展示编辑史上的一道悲壮风景——石潇纯《缘定今生 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的创新与启示

周国清, 孟昌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673-0712(2005)06-0127-03

丁玲, 在常人的眼里, 更多被提起的是其作家身份,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沙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大手笔。然而, 石潇纯编审在其装帧精美的《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一书中, 首次从编辑家的角度为作为文学家的丁玲立传。作者虽为人物立传, 却不拘泥于现存史料, 她遵从历史的真实性和差异性原则, 从不同的历史维度, 选取不同的视角对历史进行“反观”与“重构”, 使其笔下的丁玲有异于他者的立体的显示。全书在政治, 文化, 文学, 出版的广阔视阈下构筑丁玲与中国文学出版的全景图, 将她的编辑方针、编辑思路、编辑策略等贯穿于对其文学活动与办文学刊物等编辑出版活动的描述与分析之中, 成功地展示了中国现当代编辑史上的一道悲壮风景, 堪称编辑学研究的佳作。

一 以史为基, “返现”和“重构”历史现场, 展示悲壮风景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许多著名作家都曾参与过报刊杂志的编辑工作。他们的出道得益于许多著名编辑的帮助, 然后著而优则编, 亲历编辑工作之后, 又以一种反哺的情怀, 发现和培养新人, 如《新青年》的胡适、《小说月报》的茅盾、《文丛》的巴金等。丁玲也是这样的一位大作家兼编辑家, 在中国文学史和编辑出版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丁玲从1929年办《红黑》月刊开始正式步入编辑殿堂, 到1985年与舒群主编《中国》大型文学月刊直至生命结束, 编辑生涯占据了其人生历程的三分之一。丁玲在作为一个作家的同时, 将人生的重要一部分投向了中国的编辑出版事业, 以编辑家兼文学家的独到眼光发现和培养了葛琴、杨之华等众多新作家。然而, 从1955年到1979年, 丁玲遭受重创, 受打击迫害, 是其人生沉寂无语的另一个三分之一。现在看来,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编辑事业的一大损失。

该著以传主为中心, 以史实为框架, 将“丁玲不同时期所编辑报刊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返现’和‘重构’, 对作为文学家和编辑家的丁玲进行了全面考察与科学评估, 给读者以独辟蹊径的全新感受”。这种“返现”与“重构”既是对人物历史的尊重, 又是作者独具匠心的一种研究思路和学术眼光, 给人一种历史的客观性与纵深感。

作者首先追忆了丁玲成长的主要经历, 着重剖析了丁玲与文学的第一次结缘。1927年, 明星梦破碎之后的丁玲, 为一泄满腔的郁闷情绪, 有感而发一气完成了生平的第一部作品: 短篇小说《梦珂》。时任《小说月报》主编的叶圣陶在来稿中发现这部小说不同凡响, 就凭编辑极强的职业敏感决定立即采用; 两个月后, 又在显要位置推出了《沙菲女士的日记》, 丁玲一举成名。这次结缘使丁玲一生都充满了对编辑叶圣陶的感激, 也使她在后来的编辑生涯中十分注重对文学新人的培养和提携。对丁玲来说, 文学是她苦闷、彷徨的青年时代一次重要的人生邂逅。作者借此间接揭示了丁玲成长为一个文学家和文学编辑家的主客观因素和社会历史条件, 也为全书定下了一个基调。

1929年，丁玲与胡也频、沈从文为了与当时文坛剥削自己的出版商一较高低，筹办了“红黑”出版社，正式步入编辑生涯。作者认为这是丁玲的前编辑活动时期，并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文化环境出发，有理有据地分析了红黑出版社解体的原因，并以此为视点作切入，就丁玲、胡也频与沈从文的友谊产生裂痕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是政治观点的分歧导致了她与沈从文思想的分野，颇具说服力。

接着，作者就丁玲正式的编辑生涯作了历史的分期，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并对每一个时期都进行“返现”和“重构”，在历史的环境里描绘了丁玲不同凡响的编辑人生，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作者实事求是，尊重历史，通过大量翔实的资料来铺陈作为编辑家的丁玲。这主要体现在“事”和“人”两方面：对于“事”，作者就事论事，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重现当时的历史原貌，层层分析而尽量少掺入个人的主观因素；对于“人”，作者没有刻意去画圆一个人，而是力争全面展示，多侧面、多角度叙述，总结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创办编辑报刊的经验和特色及其在报刊工作上的贡献，把丁玲写得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缺憾，虽然不完美，但给人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而全书整体上史论结合，在对人物历史活动的抽取与展示中论述自己的观点。

在第五章，写“丁玲与周扬：复杂的多重恩怨”时，为了讲清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于是，从“两个口号”的论争说起，讲到了延安时期、第一次文代会时期、建国后初期，再到二次文代会时候两者关系的发展。为了说清事实，作者引用了陈明、黎辛、郑惠、张凤珠、李辉等多位作家的说法，将这一矛盾的由来、发展和激化等来龙去脉交待得十分清楚。作者也刻意避免了主观因素的参与，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为了克服主观认识的偏激和偏差，我有意识地沉淀了一年。”

石潇纯女士以清晰的思路、稳健的笔风、激昂的情绪、理性的思考，从尊重历史和还原历史出发，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轮廓分明，有血有肉，性格突出的丁玲，一个大山一样雄伟、大河一样宽阔的丁玲，勾画出了中国现当代编辑史上的一道悲壮风景。

二 观点鲜明，新意迭出，富于学术魅力

该书是一部具有创新性的著作，其创新性最主要体现在选题、写作体例和综述人物历史时所展现的理论观点，这些构成全书最大的亮色，也是其学术价值和生命力之所在。兹举二、三：

（一）视角独特，选题新颖

作者在前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本书是从编辑家的角度为丁玲立传。”简洁明了，既表达本书的主要内容为“传”，也告诉人们此传的独特视角为“编辑家”。丁玲，人们常记得她是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是著名的作家，这也是常人的研究视角；而石潇纯女士却独辟蹊径，找到了人物在文学与编辑上的切合点，突破陈规，为一个“老”人物立起了“新”传，成为了第一部从编辑学的角度研究丁玲的专著，也是编辑史个案研究的典型而又成功的可喜成果，让人不得不佩服其敏锐的意识，当然这也离不开作者自身历时十余年的编辑出版实践及女性文学研究。仅从这个独特的视角来看，“本书就具有不容置疑的开拓意义，是作者在丁玲研究园圃开垦的一片新地。”在中国编辑史研究亟待深化和呼唤细化的个案研究的今天，该著这一研究视角的转换，丰富了编辑理论和编辑史的研究内容，其价值是无容置疑的。

（二）既有观点统帅全章，又用观点提升全书

作者为了更清晰地表述自己个人的认识，在每一章节的开头基本有一个统领全篇的观点，再与作者不时显现的思想睿智相交织，既便于展开思想，又能形成一种逻辑关联；既向读者明示自己的观点，又形成了一个整体，使全书浑然一体，结构灵活有序。在第二章中，针对红黑出版社的有关问题，很多研究者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作者却通过具体的材料和详细的分析，揭示其原因有三：

其一，它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去与当时的出版商抗衡；其二，它没有社团的背景，稿源也成问题；其三，三人均缺乏办出版社的经验。

其中最主要的乃是丁玲与沈从文的办刊思想出现了分歧，并最终导致了分野。在此，作

者明确地说明：“恐怕即使有强大的经济支撑，刊物的停办也是迟早的事情了。”分析入理，令读者信服。

除此之外，针对《野百合花》的发表、周扬与丁玲的矛盾、丁玲不能即时复出等问题，作者都有中肯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

（三）发挥自身优势，将丁玲的编辑生涯分为四个时期

在《前言》中，陈漱渝先生认为作者写这本书有其自身的优势，“作者有很高的悟性，又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和女性文学研究。因此对编辑学有优于一般文学者的深刻理解，对传主的心路历程也会有优于一般男性研究者的准确把握。”对丁玲编辑生涯的分期就是明证。与一般学者对丁玲文学创作的分期有异，作者根据丁玲编辑思想、编辑策略、编辑心理的发展，又结合时代背景，提出将其编辑生涯分为四个分期，每一个时期都具有鲜明的特征：左联时期，丁玲执掌《北斗》，家仇国恨使她成为了一个战士，她实现了由激进的左派作家向革命作家的转变，由单纯的作家向作家兼编辑家的转变；在延安时期，丁玲由“昨日文小姐”，成为“今日武将军”，凭着一支纤笔，显示其创作的实力和编辑选稿的水平；建国后，丁玲达到了事业的顶峰，却也遭遇了政治生命的滑铁卢，作者围绕丁玲编辑出版和编辑教育工作，探讨了悲剧产生的根源；复出后的丁玲，以政治家的襟怀，排除万难，主持《中国》，成了生命的绝唱。这种分期特征突出，又符合对象的发展规律，说明作者对研究对象的深刻把握和独特理解，说明作者对人物的历史材料十分熟悉，搜罗宏富，下力颇勤。

三 以史鉴今，启迪来者，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作者从编辑学的角度切入对丁玲的研究，展示了一个资深编辑家大量的编辑实践活动。书中所记平实质朴，但能给人以极大的启迪性，尤其是编辑工作者，在当前某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下，如何立足于本职工作，恪守职业精神，提高职业水平，读完之后耐人寻味，发人深省。1951年11月，丁玲主持北京市的文艺整风时发表《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的长篇讲话，虽然在指导思想上有浓厚的“左”的痕迹，但她针对编辑的职责和编辑的修养等具体问题所提的意见和建议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纵观她一生的编辑实践活动，可以说她是党报文艺副刊的奠基者；是解放区文化出版事业的拓荒者，是共和国编辑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也是新时期出版体制改革的探索者和先行者。

注重处理编辑与作者的关系

作者是编辑的直接服务对象，编辑要对作者负责。办《红黑》月刊时，丁玲虽为初次办刊，但已具备了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并意识到了刊物与作者的互动；因为自己的出道得益于编辑家叶圣陶的提携，所以她一直比较注意培养新人，奖掖新人，尤其对工人作家，作者用了“心贴心”这个词语。在执掌《北斗》时，有一位署名阿涛的工人作者，顾忌于不少作家看不起工人作家的偏见，虽然寄了稿子给丁玲却并未留下真实姓名和通讯地址。丁玲因无法联系作者，就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代邮”中，鼓励这一类作家大胆地站出来，大胆地写出自己的想法。这种无私奉献的作者意识，在当代编辑工作中虽说没有完全失落，但至少有所扭曲，丁玲的精神不正给我们深刻的启迪吗？

坚持编辑标准，不为外力所动

丁玲从一开始办刊就有了自己科学客观的标准，并一直坚持，但这种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变动，如办《红黑》时，她坚持艺术和思想两大标准，甚至不惜为一篇文章的采用与否同沈从文发生了冲突；办《文艺报》期间丁玲强调刊物的政治性，强调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办《中国》时，她的标准不是政治利益，而是作品本身，她重视作品的审美价值，重视作品的主体性，重视作品的生命意义。

注重创新，强调刊物要有自己的特色和侧重点

在执掌《北斗》时，丁玲在创刊号的卷首用一个专门的栏目刊出了鲁迅送给她的木刻画《牺牲》，她认为这是一个富有意义的举动，事实也是如此。

对副刊丁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对当前的副刊都有指导意义

任《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时，丁玲创造性地提出了文艺栏（也称副刊）肩负的四重任

务，即“1) 团结边区的成名作家； 2) 尽量提拔、培养新作家； 3) 反映边区各根据地生活及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斗争的故事； 4) 提高边区的文艺水平。”为此，她千方百计地组织稿件，力争拿到当时延安的名作家、新作家的所有优秀作品在文艺栏发表。

善于发挥刊物的功能，服务于社会

这主要体现在丁玲办刊生涯的两个高峰期：一个是任《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时，她善于发挥刊物凝聚人心的力量，广泛团结新老作家，消除门户之见；另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丁玲深感“四人帮”是倒了，但文艺界的宗派势力仍很强大，为了根除文坛的宗派和歧视，实现文坛的大团结，她不顾年老体衰，也不顾多年的沉重打击，而是毅然挑起《中国》的大担。《中国》的办刊方针是五湖四海，锐意创新。五湖四海的前提是百家争鸣，消除门户之见；锐意创新体现在“给在艺术上有创新、在思想上有所主见的作品留出很大的篇幅。”

不拘泥于出版体制，具有探索精神

这主要体现在她办《中国》文学月刊时。丁玲在为《中国》的审批奔波时，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信中提到办刊体制时说：“我拟以民办公助的方式，也可以找到代为出版的地方，逐步过渡到自力更生，自负盈亏，扩大经营范围，争取上交利润。”这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提出是极不容易的。

重视编辑出版学的教育工作，讲究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注重实践对理论的反作用

丁玲主持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培养作家和文艺编辑的学府——文学研究所。丁玲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确定的教学方针是：“自学为主，教学为辅，联系实际，结合创作。”她对把大学生培养成作家，不抱希望，她看重的是从生活中走出来的作家。这对当前的高等院校编辑出版学教育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这一切，都是石潇纯女士的书中展示给我们的。由丁玲的编辑出版思想结合当前我国编辑出版工作的实际来看，该著不啻是一本具有理论创新的编辑人物传记，同时又是一本启迪现实的编辑出版学教育的优秀读本。当然，该书也不是十全十美，如第三章的第86页，作者就可以将事情叙述得更为有序，给读者以更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些文字的编辑校对也可更加仔细。然而瑕不掩瑜，这本书既有充实的内容和启迪意义，又有鲜明的个性和突出的优点，具有内在的价值和可读性。我们应该感谢丁玲，感谢石潇纯女士。

作者简介：周国清(1964-)，男，湖南桃江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编审，从事编辑学研究；孟昌(1983-)，男，浙江淳安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编辑出版学专业研究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 06期

[关于学会](#)

[网站导航](#)

[版权信息](#)

[友情链接](#)

[后台管理](#)

[联系我们](#)

Copyright (C) 2003. cpei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技术支持：北京商易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ICP备05000107号